

出版史研究

說文解字第一

• 主編：叶再生

說文解字第二

農

藤而
蜀切

𡿨

朝模
朝切

丑

丑古
岳切

气

既氣
去切

士

里士
鉏切

一

本古
勿切

巾

列山
五切

一

悉於
古切

上

上晴
掌切

示

示神
至切

三

甘三
勿切

王

方王
五切

告

告古
奧切

日

后江
切

山

犯山
切

明

泰明
切

山

山

山

山

山

水

小私
北切

八

八博
技切

采

采備
莫切

卒

慢中
博切

山

山

山

山

山

出版史研究

第一辑

《出版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 北 京 •

主 编 叶再生

副主编 周文熙

汪家熔

余甘澍

出版史研究

第一辑(1993)

出版史研究编辑部编

*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7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 200,000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

ISBN 7-5068-0162-0/G·77

定价: 7.80元

目 录

出世词..... (1)

· 专 论 ·

概论马礼逊的中国语文字典、中国最早一家现代化出

版社和中国近代出版史分期问题叶再生 (5)

出版志简论倪 波 (35)

· 考 证 ·

解开《抗战》和《抵抗》刊名的疑团苏朝纲 (47)

《不亦说乎斋随笔》两则

商无简册考奚椿年 (53)

“杀青”辨义奚椿年 (56)

· 回 顾 ·

六年征集 成绩喜人

——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史料征研工作的回顾与思考.....余甘澍 (59)

· 调 查 ·

“文化书社”研究新成果胡昭榕 (77)

· 分 论 ·

故都破晓声

- 北平《解放》报始末 谢荫明 赵 凡 (83)
- 抗战时期广西学生军报刊工作简述 龙 谦 (95)
- 1927—1937年广东中共出版事业概述 金炳亮 (107)
- 五四时期的学术著作翻译出版概观 邹振环 (117)
- 清末至解放初的英汉词典 汪家熔 (135)
- 明末私人出版业的伪盗之风 袁 逸 (151)

· 人 物 ·

周恩来与出版

- 周恩来早期的新闻出版活动 廖永武 (159)
- 周恩来与国统区革命进步的新闻出版工作 魏玉山 (167)
- 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出版 汪家熔 (182)
- 建党初期李达的出版活动 蒋曙晨 (204)
- 中国现代进步出版事业的先驱邹韬奋 雷群明 (210)
- 杨家骆及其编辑出版特色评述 徐 苏 (222)

· 书 评 ·

富有地方特色的古代出版史

- 评《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 蒋德闲 (242)
- 一部配有参考资料的大事记
- 谈《商务印书馆大事记(1897—1987)》 周文熙 (246)
- 资料：第一张军报《红军日报》 众 集 (52)
- 编后记 (251)
- 封面题字 张瑞龄 (封1)

出

世

词

《出版史研究》第一辑与大家见面了。

出版界为全国各行各业办了许多报刊，出版了许多书籍，唯独没有一个着重在研究自己历史的园地。历史是一条割不断的长河，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明天是今天的发展，只有了解了出版的昨天，才能真正理解出版的今天，认识到如何正确地走向出版的明天。在这中间，“研究”是关键。只有研究才能从历史的长河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继承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呕心沥血，默默耕耘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只有研究，才能继承全人类所创造的丰硕的出版成果；只有研究，也只有经过研究，才能使经验上升为理论，发挥为现实服务的作用。

《出版史研究》编辑部

近十年来，随着出版史和出

版志的资料征集和编纂工作的开展，上海、江苏和其他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出版史料一类的刊物，她们默默耕耘着、奋斗着，为出版史料的征集和积累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出版史的研究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这类刊物尚不多，而且大多是内部刊物，很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各地已经出现了一些出版史研究工作者；一批重要的出版史专题和出版志正在编写中，有的已经出版；出版史料的征集工作正在向纵深发展。这些，都为出版史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迫切需要一块更广泛的着重研究的阵地。史料的进一步征集和核实，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出版史志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都在呼喊着重、要求着一个全国性的着重研究的交流园地的产生。《出版史研究》就是顺应这种形势要求而编辑出版的。

《出版史研究》的宗旨是：提供研究信息，展示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交流研究心得。

《出版史研究》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学术民主的精神；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进

行科学研究。

《出版史研究》提倡学术交流，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革命先辈在长期出版活动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同时汲取全人类在世界各地所积累的思想财富。我们愿意在创造交流园地，培养学术研究风气，促进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方面做一些工作。

《出版史研究》提倡发掘、探索、研究的精神，重视史料的发掘、搜集、考证和核实；坚信掌握确实的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尊重历史事实，理解社会背景，发扬探索精神，深入事物内部，掌握事物的本质。

《出版史研究》提倡通过深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找出其规律，从而发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作用，为今人和后人提供借鉴，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事业的发展，达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

《出版史研究》是新闻出版界、学术界、教育界、历史界、图书情报界、档案博物馆界的共同园地，我们欢迎各界同行踊跃投稿，提供

你们的研究成果，并热诚地希望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

在当前学术书刊承受经济压力很难出版的形势下，本文集的出版也是面临缺少经费、经济拮据的局面。除了排字和印刷，编辑、设计、校对和出版、发行工作，都是几位热心出版史研究的同志自己动手做的，而且全部是义务的，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同行的热心帮助。我们希望文集能生存下去，为的是为出版史研究留下一块绿地。我们欢迎各界朋友的支持，加入到我们的阵地上来，共同开垦这块小小的绿地，耕耘这块小小的绿地！

概论马礼逊的中国语文字典 中国最早一家现代化出版社和 中国近代出版史分期问题

叶 再 生

本文讨论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近代中国出版史的上限，应从何时算起，至于它的下限，一般都主张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件历史大事来划线，所以本文只讨论它的上限问题。第二是中国最早的能使用铅活字排印中文书刊的现代化出版社，倒底是哪一家。第三个问题是马礼逊的《中国语文字典》。



先谈中国近代出版史的分期问题。

在具体讨论历史分期前，首先要明确分期的标准问题，要是没有一个科学的分期标准，近代出版史的分期问题就难以解决。

中国近代出版史与中国古代出版史、中国现代出版史的划分，首先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又不单纯是个时间问题。它不是单纯地以时间远近而随意地在历史的长河上划一条线所能解决的。必须科学地找出现代化出版形成的条件，它的特点、标准，

以及它与古代出版史的本质区别。随着时间的推延，数十年数百年后，从时间概念上所谓的近代、现代史，以及目前有人使用的当代史，是会发生变化的，当代史就不会再被称作当代史了。但是，区别历史上一段特定时间的本质特点、标准，它与上下邻近时期的区别，是会继续存在的，不会因时间的推延而丧失。从这里可以看出，决定某段特定历史时期的分期问题，是这段历史时期本身的特点，以及它与相邻历史时期的区别。这一点很重要，否则你就不能深刻地认识这段历史。

我不主张中国近代出版史套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方法，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中国近代出版史在中国近代史中具有它自己的特点。在中国近代史框架内，根据出版史自身的特点进行分期，这可以使我们看到出版历史的全貌和事件发展的内部联系，有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近代出版史。

要确定能反映中国出版历史实际的合适的中国近代出版史的分期标准，就必须对中国出版历史进行周密的考察，找出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特点，从而确定那些历史因素、历史事件反映了这段历史的本质，具有划时期的意义。

为此，我们需要观察一下中国近代出版史与中国古代出版史有何区别，中国近代出版史有什么特点，以及它对中国出版历史和文化发展所起的影响。

中国近代出版史和中国古代出版史相比，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是近代出版史的特征，也是与中国古代出版史时期实行的雕版刷印术，有着本质区别的

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术的发明和推行，不是一项一般性的技术改进，它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像18世纪中叶蒸气机的发明，引来了工业革命，导致了机械装置和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一样，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技术的发明，使复制技术从手工生产进入了机械生

产，极大地提高了书刊排印速度，增加了书刊的产量，降低了印刷成本，使图书从少数官吏、官厅、神职人员和绅士手中解脱出来，深入到民间；并使书刊内容从主要是宗教说教、皇室纪事、先贤立传扩大到学术、文化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知识信息得以大规模地交流，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人类创造的许多新思想、新学说得以突破国界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技术的发明，也引发了书刊在编辑思想、工作方法、组织形式、销售性质和编辑与销售干部专业化的形成。它的伟大作用，不可低估。

（二）它的第二个特点是现代概念的报刊的出现

中国书籍的出版历史悠久，但现代概念的与国计民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报刊，却是在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后才开始的。报刊的雏形出现的时间很早。中国最早的报纸有说是“开元杂报”，是用雕版刷印的，惟根据不足^①。发展到清末，已有宋体木活字排印的“京报”^②以竹纸或毛太纸印刷，每日多则十余页，少则五页，每页文字八行，每行二三十字。无中缝及书边，内容首为官门钞、次为上谕、再次为奏折，按次排列，无新闻标题，皆每日由报房抄自内阁所发抄者。

① 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称“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叶，云是唐人雕本，叶十三行，每行十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影漫漶，不甚可辨”。《中国古籍印刷史》刊登有仿制品的照片，称“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资料室藏有仿制的原件”。有人写文章指出，此原件是“人们根据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中的那段介绍并参照《通鉴》有关内容设计制作的”。可见《中国古籍印刷史》中的《开元杂报》照片是完全靠不住的。当然更不能以此证明唐代已经有了印刷新闻”。详见王洪祥《史料辨析》，《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3辑。

② 清代北京报房发行之报纸，皆称“京报”，并非是某报之专称。此处非指光绪三十三年二月，汪康年在北京创办的《京报》。也不是五四时期名记者邵飘萍所办的《京报》。

这些报刊与现代概念的报刊有着显著不同。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内容和传播范围上。《开元杂报》等类唐朝邸报，其内容也大部是皇帝的言行和国家大事的记录，发行面不广。发展到清末，“京报”等内容大致未脱出上述内容。主要也是在京师官衙中流传，少部份经过驿邮……等传到外省都会。一千多年来，报刊（那时还没有现在概念的报、刊的区别），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流传上，发展得都很慢，主要是由于长期的封闭、保守、停滞的封建制度及其生产力造成的。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术是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它一经传入中国后，就成为传播经济信息，传输西方的基督教义、民主主义思想和政经制度、科学技术，开发民智的重要工具之一。现代化出版印刷技术的输入，促进了现代概念报刊的出现，它在配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中国社会变革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如1828年由马六甲英华书院印刷所创办的《天下新闻》(Universal Magazine)月刊，据现有资料，这是最早用中文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中文杂志。该刊内容即包括有中外新闻、宗教、历史、科学等。又如在中国境内最早的一份用中文铅活字排印，由香港英华书院印字局于1853年8月创刊的《遐迩贯珍》(月刊)，该刊由传教士主编，但内容却以科学知识为主，包括科学、技术、历史、地理、政治、商业、教育、天文、医学、新闻等，宗教只是内容的一部分。此刊对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医学卫生、政治制度、风土人情、启迪人们思想等有积极作用。

(三) 中国近代出版史的另一个特点是：现代概念出版社的出现和经营方式的转变

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概念的出版社，是外国人包括西方基督教会和传教士创办的。它的出现，引来了现代出版印刷技术的传入，也捅开了当时中西两大文明相互隔绝的封闭状态（虽然是借助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基督教文明和西方新兴的政经思想和科

学技术，传输到了中国，改变了中国出版业性质，为中国印刷工业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古代出版业，长期保存着家族办、官厅办的形式，其性质是非商业性的，而且很多还是非经常性的。即使是清末皇室办的武英殿修书处亦未例外。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1728）武英殿用铜活字刷印了多达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高宗弘历在修《四库全书》时，打算用铜活字刷印从《永乐大典》内辑出的佚书，但那时武英殿的铜字铜盘已被盗窃和被熔铸成铜钱了。高宗接受了臣僚的建议，命武英殿用枣木刻制了大小活字二十五万三千五百枚。用这批活字排印了散佚书138种2300多卷，世称“武英殿聚珍板丛书”。后来这批枣木活字长期搁置库内，也因各种原因散失了，可见其一斑。虽然民间早已出现了商业性的刻书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有些城市的雕板刻书业相当兴旺。但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基本上都属于家庭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只有当现代概念的出版社建立后，它为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和“西学东渐”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和某些资本主义制度的采用，鸣锣开道；而它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发展，逐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盛行的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等体制和经营方式，开始在中国出版业出现，并逐渐发展。1897年2月，康梁等维新改革派人士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就采用股东制。中国人办报刊采用股东制，据现在所知，《知新报》为第一家。1898年3月，湖南维新改革派人士办的一份日报——《湘报》，也采资本主义体制和经营方式，它设董事会并制订章程，规定了工作人员的责任制和定额。盈利六成归报社，四成作为办事人员的奖金，奖金视工作态度和出勤率，差额发放。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在1902年2月创刊后不久，就改为股份制，共六股梁占二股。

虽然这种做法还是初步的，带有一定的过渡性质。资本主义

制度下盛行的一些经营方式，却随着中国现代化出版印刷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也随之发展。尽管在这种自由竞争中封建制度下的亲族关系、特权现象、长官命令等还在发挥重要作用。

出版社经营方式的变更自然会引起出版物流通形式的变化。

中国图书的流通，长期处在手抄传阅、馈赠亲友子弟、为先贤或先人立传立说、为保存国故，供一定范围的官吏、秀才阅览等形式。民间书市虽然出现的时间较早，但发展缓慢，长期处于集市性和小商贩经营方式。尽管资本主义的销售业已经露头，但由于封建制度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企业是有限的，在整个出版业中尚未形成主体，而且发行的距离也较短。现代出版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后，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出版业在销售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需是大规模的工业性生产。这种工业性的生产，首先出现在印刷部门，慢慢地发展到发行和编辑部门。因此，客观的经济规律，促使中国现代化的出版业，必然要依靠发展商业性的销售工作。一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盛行的销售制度、促销办法、折扣规定，包括商业性的广告等，也逐步在出版业中出现。

经营方式上质的变化，形成了中国近代出版业与古代出版业的明显区别。

(四)还有一个特点是出版行业的形成和行业内部社会分工的开始

中国的古代出版，尚未形成编、校、印、发人员齐全的独立行业，当然也没有行业内的社会分工。那时官方有时虽设有刻书处、修书处等机构，但规模有限，有编纂刻印任务时，从太学、翰林院……等处临时抽调一批编修一类官员来编纂和组织刻书，任务完成后，人员解散或大部解散；家族或寺院需要刻书或刻经时，由家族或寺院自行组织编纂刻印队伍，任务完成后，人

员也就解散。当时主持人往往参加实际工作，有的自己编纂，或书写，或参与刻印。民间虽然产生了商业性的刻书店、刻经行、贩书铺等，但规模一般较小。而且，编纂、刻印也未和销售分工，业主一般都擅长刻印或书写，自己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有自己掌管编纂工作的。总之，中国古代的出版，从外部关系看，尚未形成一个社会行业，从内部关系看，成员间也尚未形成社会分工。

现代出版，一方面由于采用了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技术，速度大大提高，成本降低了，为大批量复制和读者数量的增加创造了条件。同时它也必需有商业性的大规模销售和编辑、印刷技术的专业化来支持它的机械化印刷和产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从外部条件看，近代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育，都需要出版在传递信息，积累智慧，提高复制技术，美化社会和个人生活等方面的支持。随着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出版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

近代出版，最早是从印刷厂或者说是从印刷机开始的。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术发明后，书商也是以同时是印刷出版者的面目出现的。早先并没有现代概念的出版社，也没有印刷家、出版家、发行家、编辑家的明确分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社会上需要书刊报的人多了，加上社会对出版在快速印刷、技术精湛和广泛发行上的要求的增加，以及竞争的加剧，促进了出版行业内部专业分工的逐步形成。专门从事书刊生产的出版社、出版家就从书商、印刷厂中分离出来。后来又逐步分化出了专门负责组稿、审稿、加工、设计、校对等工作的编辑来。这一过程，欧美在经过长期的发展后，直到19世纪初才完成的。中国晚一点，大概到20世纪初才完成了这个变化。那个时期成立的出版社，虽然社名仍保留传统的书局、书店、印书馆等，如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1898年筹建、1900年正式营业

的贵州文通书局，1902年成立的文明书局，1912年成立的中华书局，以及1930年的上海龙门书局，1932年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等，都先后设有编辑所、编辑部、编辑委员会、印刷厂、印刷所、发行所、发行部等。又如1905年10月创刊的孙中山先生办的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就设有编辑部，章太炎曾担任总编辑。

从上述历史事实和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到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中国出版从手工复制发展到机械化生产，使信息的传播和交流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并引发了出版在性质、机构、出版物内容、编辑思想、经营方式、人员构成等许多方面的深刻变化，使现代出版与中国古代出版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技术的传入，使中国的出版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我认为，铅活字排版和机械化印刷技术传入中国的这件重大历史事件，可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出版史与中国古代出版史的标尺。

出版史分期中的过渡时期

那末，具体地说那一天该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日期呢？具体确定中国近代史的上限是以什么事件为标准呢？是以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技术传入中国那一天算起，还是以中国有了第一个现代概念的出版社那一天算起呢？在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前，需要明确一个理论问题，即历史时期是否是截然划分的，昨天还是古代出版史时期，今天就突然成为近代出版史时期了？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客观上不存在这种情况。

出版时期的划分属于区分文化现象，不可能象社会革命那样在夺得政权的一天之内就可改变政权和社会制度的性质。近代出